

移民社群族体化：对我国国际移民群体的前瞻性分析

范 俊*

摘要 中国境内的国际移民群体不是一种松散的个体集合，而是基于族裔聚居、族裔经济和族裔文化构成的移民社群，并呈现聚类成族的发展可能。而移民族体一旦形成，便会对当下以“民族”为单位、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框架、以中华民族建设为重要内容的族际整合模式构成挑战。在这个课题上，西方国家对国民特性的坚守、移民的族群化定位、移民政策的及时调整等做法具有借鉴意义，同时也提供了诸多教训。对于中国而言，特别需要通过树立移民族体化防范意识、实施移民社群定位下法治化治理、创新国际移民小社会专项治理机制、开展国际移民社群的认同塑造等方面的系统谋划，来提前做好准备，形成防范措施和前瞻性的族际整合思维。

关键词 移民社群；族际整合；族体；民族认同；多民族国家

DOI: 10.13835/b.eayn.31.13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与中国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国际移民^①开始迁入并居留中国。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从传统非移民国家向移民国家的巨大转型。同历史上西方移民国家的经历不同，移入中国境内的外籍人员从一开始便是以群体而非个体的形式分布，突出表现为外籍人聚居区的大量出现、族裔经济的普遍形成、族裔文化的张扬以及封闭性的社会交往等特征。这样一来，不同国别的移民群体实际上不是松散的个体集合，而是一种“移民社群（diasporas）”。对于这个概念，美国学者亨廷顿曾界定为：“民族属性和文化上跨国的社群，其成员认同于自己的祖国或已不存在的故国”，“虽生活和工作于某一地方，但却首先认同于自己的故乡”。^②聚居于中国不同区域的外籍人员，正是符合这样的社会群体的界定标准和基本特征。总观世界上有移民传统的国家，当移民社群达到一定规模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便往往会朝着族群化的方向发展，其中美国与西欧地区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为典型。根据西方经验，中国境内的国际移民群体很可能在特殊条件下，形成新的族类群体。

就国际经验来看，移民社群的族体化不仅是一种民族现象更是个民族问题，已经给移民国家带来了诸多困扰，其中移民族裔的国家认同问题、民族特性的解构风险、民族国家的安全稳定问题、民族结构多元化问题备受关注。而一旦中国境内的移民社群最终演变成为新的族性群体，当下西方移民国家所面临的这些问题也将会在我国重演并且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天然就具有复杂性，如

* 范俊，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副研究员，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

① 此处的国际移民主要指，“在我国境内居住3个月以上或能够确定将居住3个月以上的外国人”。参见罗刚：《非法移民对人口安全、国家认同的影响——基于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调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② 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02—203页。

果国际移民再带来新的民族问题，所产生的叠加效应必然会更加严峻。面对这个很可能出现的新课题，中国应立足国情并汲取西方的经验和教训，提前做好准备，尤其是形成防范措施和前瞻性的族际整合思维。

一、中国境内的移民社群及其族体化走向

在全球化快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之下，全球的移民数量都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以及越发融入世界，中国逐渐由非传统移民国家向移民国家发生转型，并且来华的国际移民数量成逐年攀升之势。《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蓝皮书指出，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籍人士为84.85万人，近十多年的年均增长率为3.9%，在“最吸引外籍人士居住的国家或地区”排名中，中国名列第三^①。而综合分析各界调查情况，中国国际移民的实际数据可能还要远高于此。中国境内的国际移民的一个突出特征便是以社群的形态分布，不仅规模较大、聚集居住，而且具有共同的经济生活，保持共同的文化观念，拥有牢固的群体凝聚力。

首先，族裔聚居的人口分布。国际移民迁入中国的原因主要有跨国务工、经商、婚姻、与在华家人团聚，以及国际难民等方面。移民类型上，既有合法移民，又包括非法移民；既有来自发达国家的移民，也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从分布上来看，中国境内的国际移民主要以族裔聚居的形式分布于东部各大城市和边境地区。目前广为人知和媒体集中报道的移民聚居情况为：北京地区的韩国人，其中以望京社区最具代表性，被称为“韩国城”；上海的日本人，多方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已成为世界第三大日本移民城市；义乌的阿拉伯穆斯林群体，这里形成了一条闻名遐迩的阿拉伯人聚居、经商、务工的“中东街”；广州的非裔移民，这类国际移民通过聚居生活已形成了著名的“巧克力城”；云南边境地区的邻国移民的人口规模也十分庞大。对于上述聚居各地的移民社群，官方基于外籍人口管理的需要，通过人口普查工作，做了不同精确程度的统计。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继续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上升，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移民迁入，中国境内的移民社群规模会持续扩大，聚居成群的现象也将愈显普遍和突出。

其次，族裔经济的形成与巩固。在中国境内，国际移民的社群特征不仅表现在族裔聚居方面，还表现在族裔经济的日渐形成。所谓族裔经济，包括移民族裔展开的经济活动，活动参与者的族裔身份，以及具有族裔特色的商品或服务^②。在中国，这种具备族裔属性的经济形态，主要存在于以经商或务工为跨国迁移目的的移民社群之中。同时，族裔经济的出现又是以移民社群成员数量的增长，以及族裔聚居区的形成为背景的。此外，近年来中国政府对于外商投资商业项目的宽松政策，也推动了族裔经济的形成和壮大。族裔经济在满足移民群体消费需求和逐利目的的同时，也从经济和利益维度强化了移民社群的身份认同，还通过经济过程以及商品或服务中蕴含的族裔属性，对族裔个体和群体的文化认同发挥了积

① 王辉耀：《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3—42页。

② Aldrich H. E. and Waldinger R.：“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6, No. 1, 1990, pp. 111—135.

极作用。因此可以说，族裔经济的出现一方面是移民社群现象的重要表征，另一方面又推动了移民社群的巩固和发展。

再次，族裔文化的保持和强化。在中国境内，无论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外籍人士，都保持着对母国文化的强烈认同和彼此之间根深蒂固的文化联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近年来外国移民迁入中国，主要是受到工具理性的驱动，其中经济利益和生存需要是最为核心的两个因素。相比之下，中国文化对于国际移民的吸引力则处于次要地位。正因如此，这些移民社群保留着鲜明的文化特性，这种文化特性也成为这类社群区分“我者”与“他者”的标准和边界。在这个方面，有学者通过观察义乌地区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群体，发现移民聚居区的异邦文化气息十分浓厚，移民社群的文化适应能力仍旧面临着严峻考验^①，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其他城市的移民社群中间。政府与社会一般对这种异域文化给予较大的宽容和扶持，进一步保障和增强了移民社群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异质性特征。

最后，社会融入的障碍。对于移民社群的基本特性，美国“耶鲁大学人际关系领域资料中心”2004年出版的全球《移民社群百科全书》总结为：“虽然散居于不同国家，但是都具有返回故国的愿望；难以同化于移入国，而与同族群体保持着各种联系。”^②中国境内的国际移民群体在这方面的表现就十分明显，普遍存在着社会与文化的融入问题。对于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曾洞见道：“说到底，同化是发生在个人身上，而不是整个群体。”^③中国的国际移民不论是迁移过程还是分布状况，都是以群体形式出现的。这种存在形式，使得作为个体的移民除了与中国居民发生必要的经济往来之外，更多的社会生活都局限在族裔群体内部，或者说这是一种相对封闭和排他的群体生活方式。此外，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移民群体同原住居民之间的利益矛盾和文化冲突时有发生，国内居民与国际移民间的互相排斥的情况也将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样一来，受中国深厚独特文化与移民社群融入动力不足双重因素影响，移民社群在中国社会中的融入都是相对困难的。时代也在发生着改变，现代国家建构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中国也很难重现历史上美国等西方移民国家中的同化和熔炉现象。

中国的移民社群本身就隶属于不同族体，但这种族体是迁出国的民族或族群，可以归类为跨国民族，但目前并不属于中国境内的族体范畴。依据基本逻辑来判断，这些移民社群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走向。一是，大部分国际移民不会成为中国的常住人口或成为中国公民，而是在完成短期的跨国迁移目的后陆续返归母国，然后又有新的移民群体迁入，重复着短期居留而后返回故土的迁徙轨迹。这是一种分散化的发展走向，其结果是中国将不断更新移民社群，但始终不会出现新的移民族体。二是，有相当数量的移民社群将永久性地居留中国，并且各个社群规模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而持续扩大，最终聚集成族从而出现新的族体。

从西方移民国家的经验观察，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中国境内的各类移民社群走向一种族体化的演变之路的可能性趋势。纵观国际移民历史，存在一种“累积因果”规律，即随着现有移民规模和移民网络的形成，移民信息将以更加准确和广泛的方式进行传播，移民成本也会相应降低，从而刺激移民潮的不

① 葛壮：《义乌阿拉伯穆斯林的文化调适之剖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6期。

② Melvin Ember, Carol R. Ember and Ian Skoggard: *Encyclopedia of Diasporas: Immigrant and Refugee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2004, pp. XIII—XXVI.

③ 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02—203页。

断出现。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国际移民过程正在经历这样的阶段^①。此后，随着常住人口的不断累积，一种“聚众成族”的现象便会出现，尤其是对于来自欠发达国家的移民社群而言，这种现象更为普遍。根据相关调查研究，中国境内的越南移民、缅甸移民、阿拉伯移民和非裔移民群体中，希望在中国长期发展或获得中国国籍的外籍人员不在少数。因此可以预见，中国的移民社群在条件成熟下发展成为新的族体，这个问题的出现具有非常大的概率。

二、现有族际整合机制可能面临的挑战

凡是多民族国家皆面临着将多样性族体整合到同一共同体之中的任务，也就是族际整合的任务，这关乎国家共同体的维系和国家疆域的统一。但是并非所有的族类群体，都具有被纳入族际整合范畴的必要。从本质上来看，“族”不一定是民族，它本身是一种社会结群现象，不仅自古有之而且十分普遍，甚至由于共同的职业特征、兴趣爱好、血缘和地缘、文化习俗都有可能出现相应的族类群体。然而，由移民社群集结而成的族体却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族类现象，他们凭借共享性文化、经济、区域、利益而成为一个稳定的共同体，甚至还依托这个共同体谋求集体权利，从而带来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目前，针对56个民族单元以外的族类群体，中国通常只要采取一般性的治理措施，便可达到社会整合目的。但是这种社会整合机制，并不适用于移民族体，对于这类可能出现的特殊的“族”必须纳入族际整合的范畴。

在对外籍人员的管理过程中，中国暂未形成有效性和系统性的规约机制，移民社群的族体化趋势依然继续并不断得到凸显。可以预见的是，一旦移民社群在中国境内演变成为新的族性群体，现有的外籍人口管理模式，必然无法使其有机融入或者同化于中国社会。不仅如此，面对可能出现的新型族体，现有的族际整合机制也远未做好准备，因此可能遭遇严峻的冲击和挑战。总体来看，中国的族际整合机制可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自然性整合机制，二是建构性整合机制。自然性族际整合，主要指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之间通过长期的交往交流活动逐渐交融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②。建构性整合机制，是指通过国家主导构建而形成的族际整合机制，特别是在构建和建设民族国家过程中所形成的族际政治整合。然而无论是自然性的族际整合机制还是建构性的族际整合机制，都不适用于移民族体。其中，自然性族际整合机制需要经过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和十分复杂的族际互动才能发挥作用。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这是一个“接触、混杂、连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③的过程。而这样的族际整合机制不仅因见效太慢而不适应当前实际，而且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现代世界体系中根本无法实现。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在建设民族国家过程中所建构形成的族际整合机制在移民族体面前也将变得无能为力。

首先，移民族体与国内各民族群体存在本质不同。同西方民族国家不同，中国的族际整合是以一个的“民族”为基本单位和对象的。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既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的人群共同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多次民族识别工作和相应的民族政策所构建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

① 梁玉成：《在广州的非洲裔移民行为的因果机制》，《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

② 习近平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③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

民族理论对于中国的民族界定和认定具有重要影响。在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总体原则之下，中国政府又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机制、政策和民族工作，对各个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权利予以了保障和强化。因此中国的“民族”不单单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也是具有政治和法律内涵的族体单元。从民族的构成要素来看，移民族体与现有的原生性民族之间存在本质性差别；而且，在业已固化的族际格局下，中国也不可能再承认和给予任何群体以“民族”地位。总之，围绕“民族”形成的族际整合，并不适用于可能形成的移民族体。

其次，作为族际整合的基本制度架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不适用于移民族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探索，领导中国人民逐步建立的一项独具特色和优势的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是“区域自治”和“民族自治”的结合，而不属于民族范畴的移民族体自然无法成为自治的主体。同时应该看到，民族自治地方是以原有行政区域为空间基础的，而非重新划分出来的政区范围，因此在移民族体的聚居地不可能形成新的自治区域。而且，这项政治制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别是为了实现对边疆民族地区的领土整合和制度整合而创建的，因此在国家政治体系已经高度一体化的今天，再也没有必要设立新的民族自治地方。因此，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框架的族际整合制度，显然不适用于可能出现的移民族体。

再次，现有的中华民族建设机制同样无法将移民族体整合进来。凡是民族国家必然存在一个与国家领土范围等大的民族共同体，即国家民族。中华民族就是中国民族国家的国族，在建构这个国族的过程中，要求将国内各个民族群体整合成为具有共同特性的共同体。在多元一体格局中，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族性群体虽各具特色，但又共同构成一个民族实体。正如费孝通所认为的，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它又是近百年来被建构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的建构工程仍在继续，其中重构各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凝聚共同文化认同，成为这项工作的两大核心内容。但是这两条中华民族的建设路径并不适用于移民族体——他们同现有的56个民族之间既无共同历史记忆也无共同文化。因此在短时间内，很难将移民族体视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也就无法通过现有的国族建设机制来统合这类新群体。

三、西方移民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在西方民族国家中，移民群体普遍经历了“国际移民—移民社群—移民族体”的三个演变阶段。西方尤其是西欧民族国家在形成之初，表现为明显的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特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构成其突出的特色。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成规模的国际移民开始涌入这些国家，并逐步聚集在一起成为新的社群，最终“那些原生性的民族国家，由于上述情况的出现而逐渐‘多民族化’了，成了‘多民族’的国家”。^① 在这样的移民历史中，西方国家曾一度形成卓有成效的移民政策和族裔政策，不仅保持了民族国家的文化特性，而且将移民现象转化为国家发展优势。但近年来，西方的移民政策和族际整合机制开始出现失灵问题，甚至由此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国家认同危机。有鉴于此，作为非

^① 周平：《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国家》，《学术探索》2016年第10期。

传统移民国家，中国要应对国际移民问题带来的潜在危机，就不得不从西方国家的移民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作为典型的移民国家，美国的移民历史最值得回溯和反思。从1607年第一个殖民据点在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建立开始，来自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移民陆续有组织地来到北美，成为这片“自由土地”的定居者、开拓者和美国文化的奠基者。一直到建国以后的较长一段时期，美国逐步形成了建立在盎格鲁—新教文化基础上的独特民族文化——“美国信念”。这种美利坚民族的文化特性包含了英语的语言使用，基督教的宗教信仰，个人主义观念，奋斗和冒险精神，自由、平等与法治信仰等诸多方面。长期以来，美国信念和盎格鲁—新教文化成为美国文明的主轴，也成为吸引外来移民前来追逐美国梦的重要动力。对此，人们曾普遍将美国社会比作一座民族熔炉，不同的族裔文化在这个国度通过彼此融合而冶炼成为美国文化。但实际上这个比喻并不贴切，对此，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就曾认为美国的同化效应类似于一锅“番茄汤”，盎格鲁—撒克逊人所持有的白人文化是番茄主料，而其他族裔文化的添加只不过是一些佐料，而不会改变它“番茄汤”的本质。^①但是，这种自然同化的良性状态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始渐发生转变，外来移民的规模由原来断续起伏状态渐变为持续增长状态，尤其是拉美裔移民所占的比重居高不下。与此同时，来自学界和政府的多元主义主张开始在族际整合过程中发挥作用，对原本一元化的美利坚文明产生了解构效应。这样一来，原有的同化机制开始发生松动甚至失灵，移民社群的同化和认同出现了障碍，美国人的身份日益被族裔身份所解构和消解，美国特性开始出现多元化、碎片化的发展趋势。对此，像亨廷顿这样的学者表示出深深的忧虑，甚至发出美国即将解体的警告。

欧洲的移民历史同样引人深思和备受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主导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逐步瓦解，由此引发了原宗主国在殖民地的外迁居民，和部分殖民地国家居民大量向欧洲迁移的“后殖民主义”移民浪潮。此后，欧洲各国出于国家重建的需要，开始大批地从其他国家引进劳工，出现了工作移民浪潮。冷战期间以国际难民为主体的移民逐渐向欧洲尤其是西欧国家聚集，冷战结束后这种类型的移民趋势并未中断，来自原东欧国家的移民、南欧的战争难民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非法移民继续向西欧迁移。以20世纪70年代为分水岭，欧洲的移民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欧洲国家的同化性移民政策占据主导，而且起到的社会整合效果也十分明显；但是在后一阶段，同化性整合措施的作用日渐式微，规模持续扩大的移民社群的族体化趋势越发突出，并且越来越难以融合于迁入国的主流社会。近年来，在这些由外来移民构成的族体中，由难民和宗教极端分子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已经变得十分棘手；移民族体和国内本土族体之间的族际矛盾和冲突也日益显露，原本一体化的社会结构正在面临着被撕裂的风险；由于移民族裔带来的多元性文化，欧洲民族国家的文化特性也正在经历从同质性向异质性的转型。

通过分析欧美民族国家的移民历史，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得到启示。一方面，历史上欧美国家在应对移民社群和移民族体问题的过程中，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其一，坚持国家的文化特性，促成移民群体的同化和融合。这样的举措多在国际移民尚未形成规模的阶段较为有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移民社群向移民族体的聚集和形成。其二，不承认外来移民的“民族”地位，从而避免了移民群体的政治化。在这个方面，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欧国家都不曾将任何移民群体界定为“nation”，而是将其限定为文化意

^① 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35页。

义上的“ethnic groups”。^① 其三，适时调整移民政策。欧美国家的移民历史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呈现曲折上升态势，在个别历史阶段甚至会出现放缓和停滞现象。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移民政策会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和社会饱和程度来随时收紧或放宽移民限制——近几十年以来的西方移民政策普遍呈现收紧倾向。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移民历史也书写了一部反面教材。一是，没有形成应对外来移民社群化和族体化问题的预防机制，同时面临突如其来的移民族体反应迟缓甚至判断失误。二是，一些理想主义的族际整合理论政策的出现，对原有的移民同化政策起到了极大的软化作用，其中不断勃兴的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主张最为典型。三是，尽管这些国家的移民政策不断调整并持续收紧，但仍未形成对于移入移民规模的有效控制和规约，许多移民国家的决策者迟迟在国际道义和本国利益之间徘徊不定。

四、前瞻性族际整合思维的建构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待移民社群的族体化问题，应尽快形成前瞻性思维和预防性措施。随着中国现代化水平发展，中国境内移民社群的规模将不断扩大。对此，要充分做好未雨绸缪的应对工作，避免西方移民国家当前因移民族体化问题而生的国家与社会撕裂的危机。鉴于此，中国可在思想上重视、社群管理制度、社会融入机制、国民塑造等方面，形成国际移民社群族体化的干预机制。

首先，树立国际移民社群族体化的防范意识。中国当前针对移民社群专项管理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和《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内容多为永久居留申请审批以及资格待遇保障等规定，人口管理思维突出，社会文化治理意识不够。当前学界研究虽开始关注移民小社会问题，但多以社会治理角度展开，缺乏对移民社群族体化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针对此问题，从西方移民国家的经验来看，至少须树立两种意识：一是，树立国家外国移民战略规划意识。在外国移民政策顶层设计中，应纳入移民社群族体化的防范意识。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高质量发展作为移民政策制定出发点，形成移民规模类型、移民社群治理的合理规划。二是，形成移民小社会的关注意识。针对当前移民小社会有成为一种独立社会形态的可能，需以专门化治理意识，坚持系统治理、协同治理、精细化治理的思维，扭转当前相关政策分散化，治理结构碎片化问题，严厉打击“三非”移民、非法宗教、非法结社等重点问题。

其次，实施移民社群定位下法治化治理。诚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② 移民社群和移民族体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区别：前者以谋求成员个体利益为主，利益诉求较为简单也容易满足，因此对移入国家的认同感也相对较强；而后者除了谋求个体利益外还谋求族体利益，并且往往依托族体单位同其他群体发生利益互动和博弈，一般在文化权利满足后便上升为追求族裔经济权利，而后又谋求族体特殊性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在西方移民国家中，普遍的做法是将这类族体限定在族群范畴，只承认其文化权利，而不给予特殊化的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利。面对可能出现的移民族体，中国要借鉴西方的经验，仅将其视为一种文化性社会群体，尽量避免关涉的社会经济问题政治化、民族

^① 郝时远：《美国等西方国家应用 ethnic group 的实证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2页。

化。同时还要始终坚持法治化治理思维，其宗教、经济、社会活动均以中国法律法规为准绳，既保障其合法权利，也避免超国民待遇出现，以免形成族体利益意识。

再次，创新国际移民小社会专项治理机制。要视国际移民小社会为专项治理问题，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化解各类风险矛盾。一是，创新社区基层治理机制。面对国际移民小区甚至是社区的出现，需要进一步优化城市基层社区自治机制。尤其要强化国际移民社区党组织能力建设，特别要加强党组织成员语言沟通、涉外法规知识等能力建设，避免国家整合力量的“脱嵌”。以志愿者、网格员等形式吸纳更多国际移民参与社区治理，构建起政府、社区、社会、国际移民构成的协商型基层治理格局。二是，创新社会关系融合机制。组织各种形式的文体活动、语言培训、技能培训、法律培训进社区，强化移民社区与地方社区的联谊互动，避免国际移民社区的隔离封闭。三是，创新国际移民服务保障机制。采取“社区+政府”等形式，贴近国际移民建立各种便捷服务制度，帮助他们克服由于语言文化不通、政策情况不熟可能产生的“抱团取暖”心理。重点要保障移民家庭子女在中国能够接受正式学校的社会化教育。

最后，开展国际移民社群的认同塑造。对于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而言，“我们是谁？”——国家认同感是一个根本性的社会政治问题。当前，西方在面对移民社群族体化趋势困扰中，其多元文化主义转向多元融合主义的趋势愈发明显。它们采取了不再任由不同移民文化群体自由甚至是疏离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策略，转向于主动塑造移民社群的国家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中国在规避外来移民族体化方面，同样需要引以为鉴，在包容与尊重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国际移民认同中国的文化和价值。一是强化外国移民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认同。要充分利用中华文化的吸引力，面向国际移民开发出更多的教育宣传机制。同时利用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内涵丰富的特征，寻找并突出移民社群文化与中华文化间的共同点。二是强化外国移民的国民认同。要对“望京韩国城”“义乌阿拉伯街”“青岛韩国人社区”“广州非洲人聚居区”等类似带有族性特征的称谓引起警惕。可以采取“新北京人”“新义乌人”“新广州人”等对冲原有族裔性称谓同时，也使其成为国民认同整合的专门机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族与地理空间的结合是极具民族动员能力的工具，因此还需对国际移民聚居区中的带有外来民族、宗教色彩的建筑符号、标识符号等加以规范。同时强化中国国家符号的嵌入，例如2023年启用的新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绘制了长城图案，加入了体现国家标识的五星元素就是很好的做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外国永久居留移民的国民义务责任，也是塑造国民认同的有效机制。

Ethnicization of immigrant communities: a prospective analysi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immigrant community

Fan Jun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immigrant group in China is not a loose collection of individuals, but a community of immigrants based on ethnic settlement, ethnic economy and ethnic culture, and presents the possibility of cluster development. Once the immigrant ethnic body is formed, it will pose a challenge to the current inter—ethnic integration model, which takes “ethnic” as a unit, the system of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as a framework,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n important content. On this topic, the western countries’ adherence to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ethnic orientation of immigrants, and the timely adjustment of immigration polici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ference, and also provide many lessons. As far as China is concerned, it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o make preparations in advance and form preventive measures and forward—looking thinking of inter—ethnic integration through establishing a preventive awareness of the nation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nt group, legalized governance under the positioning of possible new ethnic groups, innovating special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international immigrant small society, and carry out identity shaping for international immigrant group.

Key words: Immigrant community; inter — ethnic integration; ethnic group; national identity; multi—ethnic country